

特約撰述

## 國際關係理論革命芻議

An Outline to the Should-be Revolution of IR Theory

蔡東杰

### 壹、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趨勢

儘管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上，各種衝突和戰爭連綿不絕，二十世紀初兩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傷害與震撼無疑仍是空前的；由此，包括國家之間發生衝突和戰爭的起因，與人類能否尋出避免繼續自相殘殺的最終途徑等，既引發許多人的關注，從而也為後來的「國際關係理論」(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發展奠下了基礎。例如在 1919 年出席巴黎和會的英美代表便建議各國應建立專門的國際政治學術研究機構，以進行戰爭與和平的相關研究。儘管如此，不僅「戰爭與和平研究」自始迄今一直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或隱或現的主軸與焦點所在，由此也使得「理想主義」(idealism, 目的在尋出最終能徹底避免戰爭的途徑) 與「現實主義」(realism, 在暫時無法尋出最終方案前先尋出折衷途徑) 成為引領最初理論發展的兩條主要思考路線，在研究方法上，它也始終受到「歷史學」(整理國際關係互動以彌補過去以國別史為主的歷史真空) 與「政治學」(繼續以國家為單位去思考作出決策的關鍵與理性決策發展之可能性) 的影響。於此同時，冷戰在世界大戰後的接踵出現，則使國際關係的繼續緊繃在「需求面」上提供了相關理論成長的沃壤。

無論如何，隨著「全球化浪潮」在 1970 年代浮現，以及冷戰在 1980 年代的逐漸趨於尾聲，包括美蘇核武僵局、美國霸權地位相對下降、全球性互動頻率上升，以及南北差距的拉大…等，這些新現象既突顯出現實面的質變，也讓國際關係理論進入一個「百花齊放」的新階段。例如 Robert Keohane 等便在理想主義的脈絡下，吸收部份現實主義學派原理（特別是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前提），從而形成所謂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概念，既強調經濟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並希望透過「國際建制」的發展來實現世界和平的終極目標。於此同時，Kenneth Waltz 等則運用系統論與結構主義等概念，提出所謂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或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強調國際體系結構內涵對國家行為所產生之重要作用，而大國之間的權力分配乃是秩序穩定的關鍵。至於 Gideon Rose 等則在後冷戰時期提出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的概念，希望結合新現實主義之結構觀點及古典現實主義注重領導人認知與國內政治因素的途徑，從「二元認識論」角度來重新詮釋現實主義的主張。

進一步來說，國際關係理論的「百花齊放」並不僅展現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這兩條「主流」思想的自我反省與演進上，在「非主流」方面也有相當顯著的發展。例如 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便引進部分社會學理論與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觀點，並融合現實主義而提出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希望透過突顯第三世界發展與南北差距的現實問題，從宏觀面向上分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的不平等發展現象。於此同時，Robert Cox 與 Richard Ashley 等則特別從反實證主義的認識論角度，質疑並攻擊新現實主義，從而掀起一場國際關係理論史上的「批判風暴」，並在開啟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思考方向之餘，也促使關於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 結合各種形式的安全問題，提倡某種倫理學式的研究基準，認為包括性別和種族等部分低階政治問題也應被納入國際關係研究範疇) 與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企圖結合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強調文化和觀念因素對國際關係的影響，認為無政府狀態是由國家造成的，由此也帶來對國家作為研究基本單位的質疑) 等研究出現，尤其後者更被認為可形成足以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主流抗衡的第三主流學派。

除此之外，相較於長期以來，以美國學界為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一般也被稱為「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 的國際社會理論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ory) 自 Hedley Bull 以降，則更重視習慣法對國際行為的影響與進行歷史比較研究 (尤其是對非西方與非現代體系進行系統性的觀察)，強調應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尋出折衷的道路，並反對實證主義的單純思考途徑。

## 貳、當前理論發展的幾個主要問題

無論如何，描述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源流並非本文主旨所在；我們希望突顯出來的是，隨著全球結構內涵的變遷、學術環境的更自由化，以及研究資料與方法的愈來愈成熟，當前國際關係理論或許並不僅僅存在「演進」的可能性，甚至於還有徹底進行一場「革命」的必要性。在此首先要指出，當前國際關係理論普遍存在著以下三個主要問題：

### (一) 由「中心論」導引的「假普世主義」(fake cosmopolitanism)

正如眾所周知，無論理論所設定的是主體是人類、社會、國家或國際體系，一方面「單一世界」(single world, 亦即將地球表面視

為研究的環境界限)幾乎支配大多數理論對於環境界定的概念,強調「人本精神」(humanism,亦即一定程度地將所有研究對象視為平等地存在)也對包括現實主義者在內的多數研究者設下某種道德制約。不過,所有社會科學研究雖均必須以豐富的質化歷史資料作為基礎,但至少對國際關係理論而言,此種基礎無疑呈現出受到「中心論」指導所產生的偏狹影響。

大體來說,「西方中心論」(west-centric)或「歐洲中心論」乃是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指導概念,至於源自十七世紀的「西發利亞框架」(Westphalia structure,亦即將世界設定為由主權單位所共同形成的國際體系)則為其最主要的觀點。當然,一方面歐洲歷史經驗與規範能否直接套用至其他地區本來就不無疑問,時至今日,歐洲在近半個世紀以來朝向「共同體」目標發展的過程,亦對前述框架產生了直接挑戰,更甚者,例如 Barry Buzan 等也曾指出,由於當前世界中仍存在部分「前現代」國家,因此既使「西發利亞框架」無法真正具有普遍廣泛的解釋力,快速發展之現代資訊技術對國家單位所產生的「解構」效果,也讓前述框架愈來愈無法詮釋近來的世界發展趨勢。

除此之外,強調「大國中心」(power-centric)也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中心論觀點,例如「大國興衰」(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作為被長期關注的研究焦點便是一個例證。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既部份反映出受到歐洲中心論影響的結果,也因為它的確相當程度地影響當前國際政治與國際組織之發展;在此,我們並非企圖否定強權的國際影響力,但這些少數國家無法支配(dominate)這個世界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再者,由於行為主義(behaviorism)自1960年代起逐漸主導著政治學界與國際關係研究,堅持自然科學和社會科

學二者本質一致，因此一方面主張國際關係學者應努力將理論用簡約化公式加以表示，並能以定量方法進行計算，由此也促使許多資料庫建置的發展。無疑地，如果前述假設能被落實的話，將對理論研究大有助益，但不可否認的是，此種資料庫的來源與收集結果迄今仍顯示出極端不平均的現象（特別是欠缺第三世界資料之完整性），在此情況下，貿然提前以不完備資訊做出具「科學化」暗示的結論，亦只會繼續強化前述的假普世主義傾向。

（二）受「問題解決取向」導引的「非現實主義」（non-realism）

如同前一個段落中提及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浮現，與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心理震撼直接相關；其結果既使「戰爭 vs. 和平」成為理論發展的內在軸線所在，「如何解決戰爭以獲致最終和平」自然也成為研究者思索爭辯的主要焦點。對此，無論是早期的理想主義或延續威爾遜傳統的新自由主義，都試圖從「應然面」（亦即重點在於陳述世界應如何發展）將民族自決、自由貿易及國際組織等觀念重新整合；正如 E.H. Carr 所指出的，威爾遜主義最根本的缺陷就是與現實脫節地把世界設想得過於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現實主義自冷戰時期起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的主導典範，但它一方面假定權力（特別是軍事性權力）是影響國際關係的根本因素（例如像 Hans J. Morgenthau 便將國家的一切行為動機歸於獲得權力、增加權力和保持權力），甚至否定普世道德的存在意義；無論如何，不僅在 1970 年代所出現的各種全球化現象大大地削弱了現實主義基本命題的解釋力，並促使 Keohane 與 Joseph Nye 等從「互賴」角度出發，藉由「跨政府關係」對國家作為中心單位提出質疑，進而否定軍事安全總是國家首要關注問題，其次，一般

人其實忽視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重大共通性，亦即它們都認為「問題是可以解決（或至少受到控制）的」。由此角度看來，現實主義毋寧可稱為「保守的理想主義」(conservative idealism)，而理想主義則不過是「激進的理想主義」(radical idealism)罷了。

進一步來說，「問題解決取向」的研究途徑不僅忽視了對「常態」進行研究的重要性，經常也由於它習慣從「結果面」將問題發展一分為二，並從而植入意識形態或價值判斷，但在現實主義理論與前述西發利亞框架所暗示之「國家利益優先性」誘導下，往往使得各種研究所建議的解決模式充滿了「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式的威脅，最後反而對國際發展埋下不確定的變數。

### (三) 受「霸權」導引的「隱性權威主義」(recessive authoritarianism)

正如許多政治哲學家所指出的一般，二十世紀（甚至起自十八世紀末）的世界乃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時代」(Age of Ideology)；其中，革命性、全民動員性、理想與先驗性、敵我二分性與進步樂觀主義等乃多數意識形態共通特點，其結果不僅影響了人類社會思想形塑之發展（包括前述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也因此類新思想經常被借用為政治鬥爭工具，從而導致一連串國內（政黨傾軋）與國際（軍備競賽與大戰）紛爭的出現。換言之，意識形態的工具性角色乃是在「軟性戰爭」(soft war)中扮演「軟性權力」(soft power)的來源，而此種權力既成為現代霸權不可或缺的正當性基礎，霸權國家也往往慣於使用此類形式來鞏固其國際地位。

進言之，此種意識形態工具可表現於顯性的「話語霸權」與隱性的「文化霸權」上。前者是希望透過控制輿論中的關鍵概念，來達成劃定敵我二分界線的目標，例如「民主」便是當前體系中最為

關鍵的核心符號，由此，亦衍生出所謂「民主和平論」與「歷史終結論」等概念；至於後者則進一步推廣某種生活方式，目的在提升前述「普世價值」的天啟式宗教意味。無論如何，當此種概念（必然被）滲透進包括國際關係在內的各種理論建構過程時，都將因其中所意涵的「隱性權威主義」傾向，既使理論建構必須之「價值中立」（value-free）環境無法出現，當然也阻礙了理論的進展。

### 參、未來國際關係研究的應有態度

可以這麼說，正因當前國際關係理論存在著前述幾個根本性問題，因此也存在著某種「革命」的必要性；不過，如同人類歷史經驗所顯示的，革命過程幾乎都相當艱難且過程漫長，亦即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我們目前能做到的或許僅是設法討論出幾個引導性的概念來。對此，個人認為，未來的國關理論研究者或應具備以下若干態度：

（一）從人類社會跨國互動（transnational interaction in human society）著手，重新釐清國際關係的「本體」（ontology）概念

所謂「本體論」是指在觀察和研究事物時對其所做的根本假定，其中，主體性建立在主體與客體的互動基礎上，包括主動性、能動性、構成性和自由性等，而客體則具被動性、機械性和固定性等特點。正如 Richard Ashley 所指出的，在現實主義繼續作為當前國關理論主流的情況下，「國家中心主義」乃是其本體論原則，亦即將國際現實（或國際體系發展）視為個別國家欲望和行動的集合結果；相對於 Ashley 等由現象面來討論本體問題，Alexander Wendt 等則由觀念面入手，認為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本體設定乃是「物質中心主

義」，亦即過度重視物質文明及制度發展，而忽略了觀念結構的演進。正因以「個體主義」與「物質主義」為核心的主流本體論設定受到抨擊，從而至少讓我們需要的革命有了新的起點。事實上，從社會現象發展看來，國際關係研究所關注的不僅是那些存在於國家之間或被一個以上國家所共有的互動關係，目前國際社會中所存在的個體也不單只是國家，還包括眾多的個人與非政府性組織行為體，於此同時，在物質力量所導引的因果規律外，行為者在活動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反思和實踐力量確實也值得注意。更甚者，若引進觀念要素與主體間概念（inter-subjectivity）的話，不同的本體論設定也將影響方法論取捨，換言之，國際關係研究勢必得從傳統的「政治經濟分析」，邁向更具「科際整合」特性的途徑發展。

進一步來說，相對於傳統上將國際關係內容界定為「個別國家對外關係的總和」，在此則強調應該以「人類社會的跨國界互動」來取代；首先，所謂「人類社會」乃強調以人本為核心概念的社會科學科技整合，將觀察焦點回歸到人與社會互動的根本基礎，其次則所謂「跨國界」意指從現實面看來，不可否認地，「政治分析」或「政治因素」依舊相對重要且無法忽視，無論如何，將「互動」置於重點而非單向地關注研究單位之對外態度，則是企圖表示出國際社會中的動態特徵才應是國際關係研究的對象。

（二）以新實證主義（neo-positivism）作為研究基礎，來推動另一個新普世主義（neo-cosmopolitanism）

亦即真正以「全球」作為觀察範圍，不過，在此並非主張「齊頭式平等」地對待所有國家或個別單位（這與中心論同樣是漠視現實的結果），只不過反對透過「選擇性排除」（selective exclusion）過



程，主觀地認定某些資料並不重要。進一步來說，國際關係研究應以普遍存在的經驗作為基礎，然後以客觀邏輯作為工具來完成推理的過程；特別是由於人類過去以「國別或朝代中心」為主的歷史記載與論述途徑，往往使前述跨國界互動（特別是非政府間互動）成為觀察邊陲，從而讓這部份的紀錄呈現殘缺不全的現象，大大削弱了研究者從歷史經驗中去建立部分觀察法則的機會，並使當前實證主義運用在歷史解釋時，呈現出重視演繹過於歸納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前面提及應真正地以「全球」作為觀察範圍，但這並不代表個人同意「單一世界」論點；進言之，從社會活動所需要之內部互動與鏈結程度來看，或許目前真實的情況是同時存在好幾個部份重疊社會場域，因此，如何（甚至透過不同理論系列）釐清不同社會中的關係發展，以及各個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可能是未來我們必須留意的重點所在。

（三）透過新結構主義（neo-structuralism）回歸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階段性軌跡

儘管主張「國際社會理論」的英國學派被認為過於重視歷史演進，因此難以提出明確的因果假設且缺乏清晰的理論陳述，但其強調的歷史主義、異質多元主義與哲學演繹法仍具有參考價值。事實上，缺乏宏觀歷史角度與階段性演進觀點，始終是當前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研究的缺陷。例如，儘管 Gerhard Lenski 等曾根據科技、資訊交流和經濟等觀察指標，將人類社會史分為捕獵社會、低級農業社會、高級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等不同階段，其中，起源於十七至十八世紀間，由荷蘭與英國等所導引並首先在歐洲產生的工業社會階段，又被視為當前社會結構的主要特徵。進一步來說，儘管多數人

瞭解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下將產生不同的結構規範，但對所謂工業社會卻始終存在某種迷思或盲點，亦即「將工業革命起點等同於工業社會開端」，甚至在 1960 年代後，Daniel Bell 等還聲稱因為工業社會已進入一個新的變化期，因此「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 這個新階段亦隨著來臨。

很明顯地，前述論點完全忽略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過程中，所必然出現的「結構轉型過渡期」，並將所有工業社會特徵視為「一次性出現」且必然被「一次性落實」，這種無視於歷史現實的觀點既同樣存在於當前對於「民主政治」的主流論調當中，其實都不啻反映出前段所言權威主義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其結果將使研究結果難以客觀。相反地，如果將所謂「轉型過渡期」觀點放入人類社會發展脈絡的話，或許將發現自十八世紀末迄今的兩百年間，不僅可被視為結構過渡階段，此期間影響人類思維發展者也是同時包含來自農業舊結構與工業新結構的「雙重混合型態」(hybrid)，至於所謂「後工業社會」不過只突顯出「工業結構之深化與鞏固」等跡象罷了；由此角度看來，如果人類未來走向是深化工業革命影響的話，那麼當前思維邏輯的一部分（承襲自舊社會者，尤其父權觀念與土地作為爭奪標的之想法）將趨於弱化，而另外一部分（回應新結構者，例如互動層次的愈發複雜化與網路化）則將日漸加強。

當然，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也必須從此種新的結構主義觀點著手，在客觀地引進「發展」觀點後，首先重新釐清歷史資料，其次則是在此基礎上更仔細地理出工業結構的主要特徵，以及其對未來人類社會的可能影響所在，由此，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也才能開創出新局面來。

#### 肆、國際關係理論的可能走向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無論國際關係理論是否真的有「革命」的可能，一方面由於理論發展本即無法脫離現實，再加上當前國際關係格局確實存在著不斷變化的現象，由此看來，個人認為，未來的國際關係理論或許至少將朝向下列幾個走向前進：

##### （一）從強調「循環論」(cycle) 走向「演化論」(evolution)

無論受到歷史學、政治學或甚至社會科學之「自然科學化」的影響，許多政經研究者迄今仍受到「循環論」邏輯之影響，亦即透過將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予以迴圈化來建立某種可預測性（例如景氣循環或戰爭週期等），然後進一步希望藉由建構理論來控制其部份歷程對既存結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儘管有人認為，由於新自由制度主義將焦點放在「制度選擇」上，並認為透過制度可促成國家之間的長期合作，從而暗示著國際關係發展可能走出前述循環格局，但由制度本身的控制性意涵看來，邏輯與前者其實相距不遠。

值得注意的是，建構主義學派因為相對重視觀念與文化的作用，也被認為可突破機械性的歷史循環論，但個人認為，他們依舊缺乏長期演化的觀點。進言之，循環論所以存在的前提是結構的長期穩定狀態，正如前述，如果考慮到人類正全面且革命性地從傳統農業結構走向現代工業結構的話，至少在達到另一個穩定階段（亦即工業結構的全面替代）前，演化概念似乎應是發展理論過程所不可忽略的角度。

##### （二）從「一元論」(monism) 走向「多元論」(pluralism)

從學術規範來看，目前同時存在多種理論與方法的國際關係理論，似乎反映出某種「真理愈辯愈明」的競爭性常態。但此處要強

調的是，或許國際關係理論在某些基本假定方面（特別是「單一世界」概念）也應該予以修正。事實上，所謂世界本來就不能脫離「社會」的涵義，亦即它必須是「經驗性地真實存在」而非僅僅被「先驗性地假設存在」；進一步來說，所謂真實存在既必須以自願且多元地雙向互動作為經驗基礎，從當前國際格局的發展歷史而言，不可否認地，它一方面是由歐洲主觀推動的全球化進程所構成，目前此一體系存在的正當性基礎既源自歐洲的擴張性一元論概念，目前「南北衝突」議題也與此部分相關。

換言之，一元論概念非但否定了人類社會由於面對不同環境挑戰所自然且長期存在的異質性（亦即「多元世界」的現實），先人為地主地設定所有人類均擁有共同之需求與利益，而漠視此種現實的結果不僅埋下許多國際紛爭的伏筆，也將對相關理論發展形成誤導作用。由此看來，我們既必須正視多元世界的存在，或許也應接受「同時存在多套國際關係理論」的必然與必要性。

### （三）從「國際」（international）朝更重視「人際」（interpersonal）關係之方向發展

總體來說，當前國際關係理論（或國際問題觀察）雖深深感受到來自工業革命所造成的結構性衝擊，並將此革命所造成的結構變遷結果視為重要變數或研究焦點所在，但某個層面的發展似乎迄今仍被忽視，亦即在工業革命提升個體生存係數的同時，對既有社會帶來的「解構」（de-construction）效應。進言之，在可見未來，或許國家作為某種關鍵社會單位的現實暫時仍不會受到挑戰，但科技進步所帶動人際關係的愈來愈複雜多元化（例如從網路社會角度來加以觀察），已成為無法被忽視的另一個現實。

換言之，如何跳脫傳統「國家本位的集體主義」思維，在研究過程中適度地加入「小眾取向的個體主義」觀念，或將成為未來研究者無可迴避的挑戰。

